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8.06.004

# 乡村教育的风险治理：困境与超越

李帆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自我反思,为审视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乡村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在风险社会的理论关照下,发现当前乡村教育呈现出多重风险的景观,采取风险治理措施势在必行。揭示乡村教育风险治理所面临的困境,通过采取培育风险意识、推进跨区域治理合作、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以及加强风险治理制度化建设等措施以完善乡村教育风险治理的常态化机制,最终促成乡村教育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风险社会;乡村教育;乡土文化;现代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 G5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18)06-0018-07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中遭遇的多种危机促成了现代人的深刻自我反思,在此背景下“风险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界的共识:现代社会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已经渗透在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乡村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多重社会风险的影响。同时,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乡村教育的变革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自中国进入“新常态”以来农村教育变革的未来趋势性特征日趋明显<sup>[1]</sup>。处于时代变革中的乡村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如何应对风险并抓住发展机遇,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 1 风险社会的到来

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sup>[2]</sup>。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一概念,他指出当代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

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sup>[3]</sup>。风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在古代社会中“风险”意味着自然灾害,只有在近代社会“风险”的内涵和结构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意义的“风险”才得以产生。

什么是“风险”?在贝克看来,风险是指“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sup>[4]</sup>。而风险社会指的是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境,其特点是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普遍逻辑,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形态转变<sup>[5]</sup>。他敏锐地察觉,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旨在向以启蒙运动为知识基础、以民族国家为地域基础、以社会阶层为集体基础的工业社会提出挑战的根本性变化,由此形成新的社会发展形态称之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伴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sup>[6]</sup>,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失控的世界”。由于风险是一个时代和社会

收稿日期:20180622

基金项目:2018年度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8SKB049)

作者简介:李帆(1994-),男,江西吉安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的特征,所以才可以说出现了“风险社会”<sup>[7]</sup>。贝克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视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形态,其中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构成古典工业社会,古典工业社会和现代风险社会同为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形态。“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sup>[8]</sup>前者被称为第一现代性,后者被称为第二现代性(即吉登斯所称的“反思现代性”),风险社会正是与现代性伴生的后果。

风险社会有两大理论来源,即现代性与全球化。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早已被经典社会学家们所察觉,他们对现代化总体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认为随着技术的改进将会解决这些问题,但风险的积累造成了现代性危机的累积与恶化。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成为推动西方现代化重要的思想动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推动着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中强调理性,固然让讲效率、讲实用成为现代性精神中的重要部分,但过度强调理性的同时也意味着理性的衰微和失落,现代性的危机也就是在这种关系中不断孕育和扩大,风险社会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这一点,韦伯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悲观并非毫无道理,风险社会的诞生也证明其忧虑是有前瞻性的。另一方面,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将距离遥远的地域联系起来,“地球村”观念的形成更预示着这一趋势日益显著。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与风险的产生与扩展同步,“风险共同体”逐渐形成,当前社会的风险已呈现为全球性风险。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强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全球化推动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的形成,全球化呼唤并推动着风险治理机制的变革<sup>[7]</sup>。

风险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如何看待社会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取决于风险应对主体。风险与人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对风险的产生、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高发性等特点也对人的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乡村及植根于乡土的乡村教育也正处在充满风险的十字路口,如何理解并应对“风险社会中的乡村教育”及“乡村教育中的风险”也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 2 多重风险映照下的乡村教育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9]</sup>尽管距离他生活的年代已久远,当前的中国正由“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但乡村依然是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场所,乡村教育仍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实现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也离不开乡村教育的振兴。乡村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风险特征”,影响了其教化乡村学生功能的发挥。

### 2.1 难以为继的乡村学校教育

作为乡村教育活动直接开展的场域,乡村学校面向乡村儿童,依托乡土环境才能发挥出作用,但目前在乡村,“学校更似一座孤岛悬浮在乡村及其普通人的生活之上”<sup>[10]</sup>。乡村教育与乡土环境的共生关系面临危机,乡村学校面临着难以为继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数量急剧减少。由于学龄人口减少、人口流动量大等原因造成乡村学校在校人数大大减少。此外,不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依然很高,自愿性辍学取代因贫辍学成为新时期的特点。二是乡村学校数量锐减。乡村教学点减少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撤点并校加速了这一趋势,但盲目撤除乡村教学点、未对乡村教育发展做整体考虑带来的后果是造成了学生上学难、上学远等问题。三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存在不足。目前的乡村教师队伍普遍存在教师短缺、年龄结构偏大、学历偏低、性别失衡以及教学技能落后等问题。乡村教师的待遇较低、职业发展前景较差等现实原因抑制了乡村教师从教意愿,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情况凸显。一项调查研究表明首届免费师范生中仅2%愿意去农村,仅三成愿意选择教师职业<sup>[11]</sup>。四是“学校进城”的倾向明显。乡村学校在教学模式上机械复制城市教育的经验,在教学内容上极力摆脱与乡土环境的联系,必然造成乡村学校教育的“水土不服”,脱离了乡村学生的真实需要,乡村学校逐渐沦为实现对儿童“规训”的场所。五是过度强调乡村学校作为国家意志在乡村社区的“嵌入”地位。在这种理念下忽视了乡村学校传承和生产地方性知识的功能,乡土文化在现代性浪潮下面临消解,乡村的“生存危机”加剧,给乡村学校的生存境况带来了更多的潜在威胁。

### 2.2 乡村儿童的精神失落

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

物,是传承、延续、拓展文化和促进人的社会化的手段。若忽视学校教育与乡村社区、乡村文化的联系,忽视乡村教育与乡村环境的共生关系,将城市与乡村导向了教育内容上的对立,强势的“城市型”教育取向会挤占弱势的“乡村型”教育取向。乡村学校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的延伸,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力量,通过城市取向的知识传授、价值引导,强化了乡村儿童对乡村社会以外世界的向往。在把城市文化作为参照系的教育引导下,乡村儿童逐步形成对乡村及乡村生活的片面认识,在他们看来乡村及乡村文化通常与“贫穷”“愚昧”“落后”等印象相联系,城市则常与“现代”“繁华”“先进”等相联系,因此不由自主地在心理上产生背离“乡村世界”的倾向,进而失去了文化自信。乡村学校教育在开启乡村儿童知识眼界的同时,忽视了教学内容与乡村生活经验之间的融合,没有充分地引导乡村儿童理解乡村世界。乡村儿童对乡村的认同感降低,力图摆脱“农村人”身份,越来越成为乡村中的“局外人”。

脱离乡村环境的教学内容、背离乡土的教育价值取向以及盲目向往城市的教育理想,最终导致了乡村教育培养的儿童文化心理上与乡土生活世界的割裂。乡村儿童接受了和城市一样的教育,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却受限于乡村生活的时空条件。乡村儿童的个体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精神失落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

### 2.3 边缘化的教育体系地位

当前乡村教育正处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边缘-中心”格局,在这个体系中,乡村教育被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教育挤压到了边缘区域。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凸显,甚至在微观上呈现出“城乡教师之间出现一种知识及其权力的支配与依附的关系”<sup>[12]</sup>。这一局面的产生与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有关,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自全球化进程以来,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核心地位,并将这种地位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领先。处于边缘化的中国奋力追赶,在向欧美国家学习现代化的同时,将传统教育置于边缘位置,而中国的乡村教育又是整个中国教育的边缘<sup>[13]</sup>。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中,乡村教育发展一直处在曲折波动中,甚至有些时期还出现倒退现象,在特定时期“几乎落到一种断层的地步”<sup>[14]</sup>。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潮

席卷而来,乡村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教育资源向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聚集,造成了乡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匮乏,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大差距被逐渐拉到失控的边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目前乡村教育的多重问题是几十年城乡发展矛盾的积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牺牲乡村来发展城市的畸形发展模式下潜在问题的集中爆发。

虽然目前国家在办学经费投入上向乡村倾斜,各乡村学校在校舍建设、图书馆、宿舍、教室等硬件设施上已基本满足,但在多媒体教学、信息技术使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观念更新等“软件”方面与城市地区还有着难以填平的沟壑。尽管国家当前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乡村教师培训等重大战略中都包含着改变乡村教育面貌的决心,但乡村教育在教育体系中边缘化的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观,在未来还需要更多的政策、物质、人力投入。乡村教育在教育体系中边缘化局面的持续,意味着风险的持续,在风险治理中也应当注重为乡村教育重新定位,确保其教育目标的精准。

## 3 乡村教育的风险特征与治理困境

### 3.1 乡村教育的风险特征

教育活动依托社会基础得以展开,乡村教育呈现出的多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社会风险在具体情境中的投射,是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时代特征。总体来讲,当下乡村教育中的风险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1) 风险的传递性。乡村教育要在一定场域内才能展开,需要一定的环境要素支持。在这个教育生态系统中,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应当在整体中实现其功能。教育系统具有层次性,处于低位的乡村教育成了城市教育转嫁风险的对象,风险也正是在地域传递中得到了传播和扩散。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让风险传播超越了地域、时间限制,扩大了传播范围,风险也具备了更大的威胁。

2) 技术风险嵌入已有教育活动中。技术性风险突出体现在现代技术的应用给教育活动带来挑战。大数据、新媒体、人工智能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学习方式面临变革,教师的教学理念、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同时,新技术的使用也引发伦理的危机,对于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论争持续不断,如何运用新

技术来做好教学工作,道德如何在技术理性中生长,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3)潜在风险无处不在。乡村教育的风险是多重的,已表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是在学校环境中处于“缄默”状态。显性的风险呈现出多种类型和表现形式,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但潜在的风险却常常处于被忽视状态。风险不仅在乡村学校内部发生,在乡土社会这一生态系统中还存在着更多潜在的风险。

4)制度化的风险渐成趋势。与工业社会的自然风险和保险风险相比,风险社会更多的是“人造风险”<sup>[15]</sup>。乡村教育中风险的形成很大比例都是由于制度(如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就近上学政策)设置而引发的,在历史变革中得到了扩展,并最终形成了“制度化”的风险。乡村教育相关主体在做出行动选择时带有浓厚的个体色彩,加速了新风险的产生,加剧了已有风险的后果,由此风险也具备了“制度性”的特点,即实现了风险的“制度化”。

### 3.2 乡村教育风险的治理困境

“风险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社会发现的思想来分析反思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与发展问题。”<sup>[16]</sup>风险社会的根本选择在于风险治理<sup>[15]</sup>,当前风险多发的乡村教育呼唤科学合理的风险治理机制。风险治理理念的出现,是对现代社会“风险常态化”的回应,为人类成功跨越风险社会提供新思路。针对当前农村教育运行中的多重风险景观,我们可以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关照下对乡村教育做出更为全面的认识,采取风险治理手段,从而促进乡村教育的良性发展。但由于风险治理经验不足、治理理念滞后、治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当前乡村教育风险治理呈现多种不足。

#### 3.2.1 治理主体风险意识薄弱

在贝克看来,风险也意味着对风险的认识和认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反思风险和风险意识启蒙来化解。风险之所以是风险,是因为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其具有潜在的危害,风险“只是一种危害的趋势”<sup>[17]</sup>,没有被意识到的风险就不是风险。治理风险的前提在于人意识到了风险,对风险的潜在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并由此寻找适合的治理路径。有风险存在,就会有人们对风险的概念把握,即风险意识<sup>[18]</sup>。风险意识是“人们对社会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一种思想准

备、思想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应对态度和知识储备”<sup>[19]</sup>。风险意识是建立在对风险客观事实的认识基础上,是预防和治理风险的前提条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寻求风险意识自觉,将风险意识与责任意识联系起来,并付诸行动是落在实处的举措。当前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风险意识薄弱,从风险的产生与扩散到治理应对过程中都没有形成清醒的认识,也就谈不上科学有效的治理了。这一问题的现实表现为:对风险的内涵尚不明确,对风险的潜在后果认识不清,对潜在风险视而不见;对风险保持焦虑和茫然的态度,没有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在风险治理中感到不知所措;没有形成体系化的风险治理机制,治理过程混乱无序。

#### 3.2.2 治理力量的个体化

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决定了应对乡村教育的风险必须寻求多方合作。理想状态下,在乡村教育风险治理中,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组织都应是独立的治理主体,教育行政部门作为风险治理主体结构中的核心,应该整合多方力量参与到风险治理过程中。但在实际情况中,各治理主体的沟通机制不畅通,信息交流不对称,治理力量过于分散。在地域上,缺乏城乡、地域之间的协作,无法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

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构成了教育体系的两极,乡村教育的风险来源也可能是城市。仅仅在农村地区采取风险治理难以触及问题根源,仅仅依靠在农村地区的治理措施也难以实现治理目标。将风险治理的范围局限在一个地方的做法也是很片面的,忽视了整体环境的决定因素。教育行政部门在政策和宏观层面投入治理,乡村学校的治理主要通过教学活动和学校管理手段,乡村社区难以参与风险治理中,社会组织缺乏治理能力。缺乏信息公开,社会公众对治理过程难以形成监督,阻碍了治理过程的公正透明。在当前治理各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下,乡村教育的风险治理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形成治理合力,反而造成了“1+1 < 2”的结果,尽管投入了大量物力财力,却依然没能遏制频发的风险。在孤立的治理过程中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无效治理”和“过度治理”问题突出。

#### 3.2.3 治理主体的“国家”至上

乡村教育涉及主体众多,包括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乡村社区、学生、教师、家长等共同构成了主体结构。在学校场域中,教师、学生直接参

与教育活动中,是风险治理的直接主体。同时应看到,乡村教育是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须在乡村生态系统中才能实现其功能,多元主体共同运作是促成其运作的基础。但当前过于强调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在乡村教育风险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只注重传统的“管理”而非治理,忽视了乡村教育风险治理中其他主体的能动性,将国家误认为是唯一的风险治理主体。在“国家至上”的治理结构中,乡村教育的风险治理过度强调国家层面的要求,而忽视了学校场域中直接主体的需要,在宏观上过于重视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忽视了微观上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个体发展。在办学中表现为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质量评估的过程中都缺乏学校、教师、家长的参与,学校只是机械地执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而未能真正以治理主体的角色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在治理中的关联性不强。

由于学生、教师、家长的参与意识薄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未主动参与风险治理中。社会组织不健全,无法形成一股参与乡村教育风险治理的力量。各主体治理能力薄弱,在强势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排斥下,游离在乡村教育风险治理体系外。教育行政部门也存在失灵和“有组织的不作为”的风险,在乡村教育风险治理中可能助长了风险的扩散,甚至成为风险的来源。

#### 3.2.4 治理应对机制的匮乏

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现代社会风险多发的复杂情境也表明,要想做到未雨绸缪,就必须建立制度化的风险治理手段,这样在治理风险时就不会措手不及。从风险的角度而言,制度和治理是人类辨别风险、分担风险、应对风险的稳定化行为模式<sup>[20]</sup>。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常态化治理机制,体现在:没有做好乡村教育风险预警工作,以至于当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时人们显得束手无措,造成公众的恐慌;在风险发生时难以对风险做精确的监测,难以形成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结果;在治理过程中信息沟通不足,风险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没能及时获得信息反馈;低效率的风险治理人员组织极易导致治理结果达不到预期目标,各治理主体互相推卸风险治理责任。此外,已有的风险治理机制中也存在结构性失效和制度性失效的风险,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对风险治理目标的实现有很大阻碍。制度性的治理活动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僵化的管理做法也有“有组织的

不负责任”的风险,错误的决策和行为带来坏的结果,人为活动催生了新的风险。在乡村教育风险治理中克服现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不断生产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乡村教育中的多重风险呼唤着风险治理机制的出现,而在风险治理过程中,人为因素加大了治理过程的风险,实现了风险后果的扩散和传播,让乡村教育风险治理陷入困境。

## 4 走向多元共治的风险治理路径

当前乡村教育展现出的风险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全球风险”的微观呈现,对国家、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力量,建立健全多元共治的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多元共治模式包括以下内涵: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摒弃传统的“管理”思维;多元主体的参与,摒弃单一治理主体思维,让利益相关者都能平等参与到乡村教育的风险治理中;治理过程是公开透明的,社会各界都能平等地关注和监督;治理的制度性保障,形成一整套详细的方案,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误;寻求跨区域、社会力量的合作,在协作中实现治理。为让这一治理模式落到实处,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 4.1 培育风险意识

风险常与“不确定”紧密联系,“不确定”属于主观范畴关系,而“风险”带有很强的客观成分<sup>[21]</sup>。“不确定”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风险,对不确定因素及未知的不可控因素的考虑推动着风险由观念转向实在。风险与人密不可分,正是由于人的活动使风险成为现代社会中独具特色的景象,在自我反思中寻求风险的治理路径显得尤为必要。在风险文化理论看来,风险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只不过人们的风险意识增强了,认识到了更多的风险存在。明白这一点,对风险意识的形成有很大帮助,社会公众在面对乡村教育中的突发事件时就不会手足无措,陷入恐慌。风险意识包含两个意思:对风险所应持有的态度与理解以及对风险理论的认知与掌握<sup>[18]</sup>。树立风险意识,培养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自觉,提升个体风险治理能力,是实现乡村教育风险治理目标的重要保障。

在社会中营造出防范风险的氛围,将风险意识教育落到实处。政府要承担起风险防治的责任主体,确保正确的引导。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乡

村教师展开常规性风险意识教育活动,提高教师应对风险的能力。学校也应当及时开展教研,提升风险自觉意识。新闻媒体也应做好舆论宣传导向,承担起风险教育宣讲的功能,加大对风险教育的宣讲力度。同时也应当注重在风险伦理方面对公众的正确引导,通过这些方式提高全社会的风险防范意识。

#### 4.2 推进跨区域治理合作

当代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传递性意味着风险的危害可能来自外部环境的传播扩散。乡村教育的社会风险不仅来自乡村内部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城市教育转嫁风险的后果,并借助城镇化浪潮实现了风险扩散和转移。风险不仅仅是在一个地区发生,也可能是在传播中得到了扩展和放大,因此,乡村教育的风险治理也不能局限在乡村地区。积极寻求区域合作,在城乡融合中实现风险治理的合作,是可行出路。为此需要建构一种风险治理的伙伴关系,在区域、城乡之间摒弃“各自为政”的观念,平等参与到乡村教育风险治理过程中,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对话合作,形成良性的合作机制。政府要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组织协调功能,及时引导各治理主体达成协调共识。制定出一系列的多边合作规则和程序,以保证制度性的区域合作得以实现,让多方利益主体能平等对话,在尊重对方观念的基础上做到风险共识。在区域合作中,需要尊重各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主体性,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跨区域合作时,更要考虑地方情况的独特性,在对风险事实做充分考察后再提出风险治理的协调对策,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 4.3 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

风险治理体制的创建,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具备在风险治理中的领导组织能力和合法强制力。非政府组织(NGO)、乡村社区、乡村学校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他们与乡村教育的联系更紧密,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更能灵活处理,具有政府部门所不具备的优势,是政府治理功能的有效补充。政府承担主要治理责任,同时有对其他治理主体进行监督和指导的责任。政府在此体制中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在机构设置上给予指导,对具体操作情况做监督。发挥非政府组织、学校和农村社区的自主性,依据各自的优势在风险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在资源和信

息交换的过程中进行相互监督,以免任何一个主体脱离风险治理的目标。

建立“政府为主,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教育风险治理体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发挥带头作用,民间机构、学校及乡村社区都能平等参与到风险治理中的格局。在这一治理体系中,教育行政部门在顶层设计和方向指引上提供宏观把握,乡村学校根据本校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乡村社区积极参与到家校合作中保持与学校的紧密联系,社会组织也以第三方机构的形式参与风险评估和检测。

#### 4.4 加强风险治理制度化建设

乡村教育的社会风险呈现出动态性,在现代性背景下其后果也往往难以预料,依靠常态化的风险治理机制以实现长远治理是应有之义。

首先,要建立乡村教育风险发生预警机制。设立风险发生预警机构,其成员可由教育行政部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师、家长代表组成,在全面收集风险信息的基础上,分析风险发生的原因并评估可能造成的损失。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纳入政府的方案中,确保实时监控,在风险发生时能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依据。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乡村教育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在开放的风险治理体系内,做到风险治理主体与乡村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沟通,在沟通中注重信息畅通和公开透明。

再次,是做到风险应激处理,政府应该发挥在这一应激系统中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各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中。

最后,是建立风险问责机制,对风险治理中多主体的责任做分析,合理分配各主体的风险责任,并确保能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主体,避免各治理主体反面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活动<sup>[22]</sup>。同时应注意防止“制度性”风险,避免在乡村教育的制度化风险治理过程中产生新的风险。

自此,乡村教育的风险发生预警机制、风险信息沟通机制、风险应激处置机制、风险问责机制在风险治理体系中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共治的运行模式。

#### 参考文献:

- [1] 贾志国. 新常态下农村教育变革趋势研究[J]. 当代教育论坛, 2017(5): 1-9.

- [2] Luhmann 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M]. Berlin: de Gruyter, 1993.
- [3] 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3): 26-45.
- [4]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吴英姿, 孙淑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 [6]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周红云,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杨雪冬, 丁开杰, 陈家刚, 等. 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8]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0] 刘云杉. “悬浮的孤岛”及其突围——再认识中国乡村教育[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1): 14-19.
- [11] 甘丽华. 调查显示: 首届免费师范生仅2%愿去农村, 仅三成选择从事教学类职业[N]. 中国青年报, 2011-03-12(03).
- [12] 刘丹丹, 唐松林. 论城乡教师知识权力的不对称性: 支配与依附[J]. 当代教育论坛, 2014(4): 55-63.
- [13] 储朝晖.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乡村教育边缘化问题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2(5): 45-50.
- [14] 杜尚荣, 崔友兴.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70-78.
- [15] 杨永伟, 夏玉珍. 风险社会的理论阐释——兼论风险治理[J]. 学习与探索, 2016(5): 35-40.
- [16] 刘岩. 风险社会理论新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17] 庄友刚. 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18] 贾英健. 风险意识与中国现代性构建[J]. 理论学刊, 2015(11): 75-82.
- [19] 黄庆桥. 科学的风险意识与和谐社会的建设[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9): 68-71.
- [20] 杨雪冬.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J]. 行政论坛, 2016(3): 1-7.
- [21] 斯万·欧维·汉森. 知识社会中的不确定性[J]. 刘北成, 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3(1): 36-44.
- [22] 杨雪冬. 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5(1): 87-90.

## Risk Management of Rural Education: Predicament and Transcendence

LI F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s a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theory of risk societ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rur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risk society, we find that rural education presents multiple risks.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measure of risk management. To reveal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education risk management, we can take the measures of cultivating risk awareness, promoting cross region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risk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normaliz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educ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eventually facilita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Key words:** risk society; rural education; rural culture; modernity; management

(责任校对 王小飞)